

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国际政治学： 西方斯拉夫学视野下的俄国大众文学^{*}

林精华

【内容提要】 彼得一世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推动了城市化和世俗化在俄罗斯帝国的展开，从而促成大众文学在俄国产生和发展。帝俄和苏联引进西欧文学艺术的目的是要培养居民的高雅审美趣味、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有意识地设计审查制度、文学艺术经典化机制和文学批评观念等，把文学艺术划分高级与低级，以排斥西欧的通俗文学。这样一来，即便俄国城市化过程三百年来大众文学是一种规模庞大的事实，也没有得到俄国和欧美主流学界的重视。但如同俄国每个时代总有批评家关注到这一文学现象那样，西方斯拉夫学自冷战时代伊始，便正视大众文学在俄国存在之事实，并按欧洲传统人文学学术范式，把大众文学视为民主表达方式，对俄罗斯大众文学进行了不同于俄国的论述，如发现了苏俄科幻小说的独特性，发掘了俄罗斯侦探小说等。

【关键词】 俄罗斯 大众文学 斯拉夫学 冷战 后冷战

【作者简介】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燕京学者，安徽大学至诚讲席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市教委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DOI:10.20018/j.cnki.reecas.2022.06.007

所谓俄罗斯文学，习惯性认为由从普希金到瓦连京·拉斯普京等等经典作家所构成，进一步深究就会产生困惑，他们究竟依托了哪些审美资源才创造了近两百年的辉煌？18 世纪之前的古罗斯传统，至少也应是现代俄罗斯文学的重要资源，但在 18 世纪以来的世俗化改革中，俄罗斯文学是如何面对大规模翻译欧洲流行文学之浪潮，以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的一部又一部俄国畅销书呢？也就是说，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剑桥俄罗斯文学（九卷本）翻译与研究”（14ZDB089）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普林斯顿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访问教授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访问学者项目支持。

在这些经典之外，还有成就这些经典的庞大基数。例如，后来声望赫赫的特列佳科夫斯基（В. Тредяковский）实际上成名于创造性翻译法国言情小说《爱情岛之旅》（1730），而 18 世纪中叶楚尔科夫（М. Чулков）的畅销书《嘲弄人的人，或斯拉夫民间故事》（1766）、《靓丽女厨，又名浪荡女奇遇记》（1770）等堪称俄国第一批长篇小说。普希金初入文坛并非就被视为高雅经典，而被视为时尚的艳情诗人——象征主义诗人勃留索夫（В. Брюсов）遗作《我的普希金》（1929）生动记录了这样的情景；苏联时代，列宁格勒大学教授普罗普论述了这位伟大诗人不拒绝使用流行小说所热衷的庸俗话题^①。在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1834）和《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1835）等重要文献中，19 世纪 20~40 年代俄国流行的是公务员扎果斯金（М. Загоскин）的作品，这位创作 29 部小说、17 部剧作的高产作家，当时的文学声誉远超普希金^②。当时流行文学家很多，据斯米尔金（А. Смирдин）主编的《百名俄罗斯文学家》，还包括布尔加林、维列夫金、卡缅斯基、克雷洛夫、马萨利斯基、纳杰日金、巴纳热夫等；别林斯基发表同名书评盛赞该作，“对俄罗斯读者而言，这是重要又盛大的事件！”^③契诃夫在成名之前发表了难以计数的通俗短篇小说，此后的题材仍是市民读者关心的市民生活。高尔基也是大众小说的产物，诸多流浪汉小说和自传体三部曲描述了蓝领工人阅读流行小说的情景。到 20 世纪初，流行的不单有托尔斯泰作品、高尔基书写市民社会的小说，更有反复再版的《著名的莫斯科侦探万卡·卡因》（1900）、《马卡尔科杜舍古波之彼得堡历险记》（1901）等畅销书，甚至在 1928 年——标志着斯大林体制开始真正形成的年代，白银时代著名女性大众小说家维尔彼茨卡雅（А. Вербицкая）去世，却能安葬在俄国文化名人的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与这些流行文学相比，象征派和阿克梅派则是小众文学，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知》（1940）中批评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闭锁现象。

正因有大众文学基因和传统，苏联解体伊始，出现了阿库宁（Б. Акунин）、玛丽尼娜（А. Маринина）、东佐娃（Д. Донцова）等畅销书作家，其作品常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相应地，阅读大众文学作品、欣赏由这些作品改编而来的影

① Пропп В. Мотивы лубочных повестей в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и А. Пушкина “Сон” 1816. Труды Отдел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 С. 535 – 537

② Сальниковый А. (сост.)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Загоскина в 2 томах. Т. 1. СПб.: В. Губинского, 1902, С. 1 – 4.

③ Сто русских литераторов. Издание книгопродавца А. Смирдина. Том второй//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841, т. XVIII, № 7, отд. V “Критика”, С. 1.

视，成为后苏联俄国人的重要审美内容，甚至是其生活方式之一，这也是和苏联时代审美区分开来的关键标志。



然而，如此重要的大众文学现象，未能进入持续繁荣的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视域，以至于冷战时代问世的大众文化研究力作，如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的《糟糕趣味的结构》（1964）、社会学家斯威伍德（Alan Swingewood）的《大众文化神话》（1977）、纽约州立大学罗斯（Andrew Ross）教授的《不尊重：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1989）、斯坦福大学柯林斯（Jim Collins）教授的《大众艺术哲学》（1989）和《不寻常文化：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1989）等，皆鲜有俄苏大众文学踪影；后冷战时代欧美重建大众文学理论，同样不考虑俄国大众文学。造成如此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

首先，当然是因为冷战！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看来，伴随着欧洲城市化过程的是通俗文学的产生和扩张，从18世纪开始流行通俗文学——历险记、艳情小说、书信体小说和日记体小说等，到19世纪初出现历史小说、19世纪中期产生社会小说和科幻小说、19世纪末产生侦探小说，这些文学与大众文化工业之勃兴相关联。20世纪美国鼓励黑人爵士乐、好莱坞电影、百老汇戏剧等也顺理成章，因为这些流行文艺彰显了西方乃自由世界的理念，这些不同于古典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显示出民主社会的人性张扬、自由社会的创造力。英国伯明翰学派在冷战时代引人关注，就在于它改变了贵族精英否定性对待大众文化的惯例，依据欧美文化产业和消费主义审美现象，把大众文化之生产和消费视为整体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论述劳工阶级的大众文化需求之合法性。换句话说，二战后大众文化研究在欧美的兴盛，基于西方把“民主”作为政治正确，而苏联作为“民主”世界之威胁，不可能生产出体现受众自由意志的大众文化，断言此乃西方比苏联及其阵营更具魅力的又一个标识。

其次，斯拉夫学界在文学研究范式上遵循欧洲人文学术，在冷战之前关注的多是既成的俄罗斯“经典”及其所可能包含的问题，而较少探讨俄罗斯经典机制形成的帝俄认同问题。正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欧洲人文学界不重视研究大众文学一样，对所谓背离传统人文修养的“大众文学”及其在俄国的情况，自然漠不关心。自法国驻俄使馆二秘沃盖（Eugene - Melchior de Vogue）退职后著述

《俄罗斯长篇小说》(Le Roman Russe, 1886)以降,任何西文俄罗斯文学史皆鲜有触及大众文学。例如瓦利斯泽维斯基用法文著述的《俄罗斯文学史》(1900),重点论述 18 世纪文学,只提及特列加科夫斯基翻译贺拉斯《论诗艺》、布瓦洛《论诗艺》和《爱情岛之旅》,根本不论述楚尔科夫《靓丽厨娘》和《万卡·卡因》之类 18 世纪最著名作品^①。同样,牛津大学威廉·布朗教授(William Edward Brown)的四卷本《浪漫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文学》(1986),虽触及了 19 世纪初许多流行作家作品,但归之于浪漫主义概念之下,而不视之为大众文学。更有甚者,莫泽尔在其《剑桥俄罗斯文学史》(1989)这部享誉斯拉夫学界之作中,论述特列加科夫斯基创作的篇幅不少,但多限于讨论其诗歌创作,即便触及翻译《爱情岛之旅》,也多限于翻译技术和翻译过程方面^②。如此情形,在后冷战时代亦然,石溪大学教授雷热夫斯基(Nicholas Rzhevsky)主编的《俄罗斯文学选:从最早作品到现代小说》(1996)也未收录任何一篇大众文学作品。当时已在英国斯拉夫学界崭露头角的牛津大学副教授凯莉(Catriona Kelly),其《俄罗斯女性写作史,1820~1992》(1994)、《俄罗斯女性作品选,1777~1992》(1994)还原了被俄国正统文学史观所屏蔽了的女性作家创作之真相,但对白银时代诸多畅销书女作家则未涉及。

第三,俄国大众文学不被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界重视,还与西方对俄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相关。在西方学者看来,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工业的产物,与城市化水平相关联。而关于俄国城市化问题研究之力作,如芝加哥大学现代地理学奠基人哈里斯(Chauncy D. Harris)的《苏联城市》(1972)、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地理学教授贝特(James H. Bate)的《彼得堡:工业化与变革》(1976)和《苏联城市:理想与现实》(1980)、塔尔萨大学历史系教授布兰德里(Joseph Bradley)的《农夫与莫斯科市民:晚期俄罗斯帝国的城市化》(1985)、肯塔基州森特(中央)学院历史系教授哈姆(Michael F. Hamm)的《俄国历史上的城市》(1976)和《晚期俄罗斯帝国的城市》(1986),以及纽约大学教授贝尔托(Alain Bertaud)和世界银行高级顾问雷诺(Bertrand Renaud)的《没有土地市场的城市:社会主义城市的定位和用途》(1995)等,皆按西方城市化标准——经

^① Kazimierz Waliszewski,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900, pp. 70-71.

^② Charles Mos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0-52.

济发展自由程度、人口流动水平、市民自治状况等去讨论俄国城市化的低质量问题，并不顾及传统俄国城市以大教堂（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兼顾宗教、政治、军事和地理等核心要素的方法。这样的俄国城市研究为西方人文学界忽视俄国大众文化提供了合法化依据。

这样，在西方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研究中，无视俄苏就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样的大众文化研究格局，其实际影响力不可低估：俄国大众文学艺术产品在国际大众文化市场上的份额很有限，甚至在有俄苏文学情结的中国也很不畅销，无论是在冷战时代，还是后冷战岁月。斯拉夫学界长期忽视大众文学在帝俄和苏联发展的情形，如克拉根福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诺伊豪泽尔就触及欧洲流行文学的俄译情况，但不视之为流行文学，完全按欧洲浪漫主义概念进行论述^①。

然而，俄国城市化路径不同于欧洲：传统城市在古罗斯以正教堂为中心而向四周扩散开来，在18世纪帝俄世俗化改革中，教堂仍是扩建城市的始基，且新建城市的结构亦然。彼得一世以来主导的东正教会改革，多限于教会制度——教权在皇权之下为国家认同和社区居民信仰服务，和欧洲基督教改革客观上推动市民社会建立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戴维斯加州大学教授布劳尔认为，莫斯科和彼得堡远不是工业化的产物，更是延续俄罗斯传统的场所^②。这等城市注定了其所孕育出的大众文化不同于欧美工业化主导下的城市化的大众文化，直到布尔什维克用红色政治概念替代圣罗斯作为城市中心，这一传统被改变，才产生了群众性文化。而冷战以来的西方斯拉夫学，除遵循欧洲学术范式之外，还需兼顾二战后全球的现代化及其后果即现代性问题。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克洛夫研究俄国农民和社会教育问题，触及大众文化在农村扩展，描述1861年改革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如越来越多的农民与庄园关系开始松绑，也有机会分享现代教育，并接触到从城市流溢出来的大众文化^③。贝特教授考察彼得堡这个欧化大都市在城市化水平上如何加速扩大现代性要素，但发现斯拉夫—俄罗斯传统、农民工及其后代仍在彼得堡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决定了其现代主义运动有着强烈的俄罗斯特性，和巴黎、伦敦、柏林等大都市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及其深入

① Rudolf Neuhauser, *Towards the Romantic Age: Essays on Sentimental and Preromantic Literature in Russia*.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pp. 15 – 16.

② Daniel R. Brower, *The Russian Cit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1850 – 19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③ Ben Eklof, *Russian Peasant Schools*.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日常生活的程度相去甚远^①。同样重要的是，文学史建构中的关键词，如“浪漫主义”须和“帝国”或“现代民族国家”之类概念兴起相关联，这就激发一些斯拉夫学者重新认识浪漫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正视当时广为畅销的流行文学作品，如时任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普鲁茨科夫（Н. И. Пруцков）主编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罗斯文学史》（1980~1983），忽视甚至否定大众文学，而布朗教授的洋洋洒洒之作《18 世纪俄国文学史》（1980）严格按文学史进程讨论期间重要文学家，也少用“大众文学”概念，虽然大篇幅正面论及艾明、楚尔科夫、卡拉姆津等的畅销作品，看到了他们对历险记或旅行记这一流行文学的贡献，并强调翻译文学在其中的巨大影响力^②。尤其是，后者的四卷本《浪漫主义时期俄罗斯文学史》（1986）还论述扎果斯金等 19 世纪初畅销书作家，将其视之为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乃中性概念，既不好也不坏，既没有‘进步’也没有‘倒退’，美学和文学风格运动并不设定终极目标或方向”，“俄国从国外接受文学动力的方向，就包括来自法国的古典主义、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俄国在创造 19 世纪现实主义方面执欧洲文学之牛耳”^③。这样一来，大众文学在该作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呈现，尤其是被苏联所否定的扎果斯金、布尔加林、马尔林斯基等畅销书作家，得到专章论述。这种不同于苏联的论述在斯拉夫学中绝非个案。斯坦福大学斯拉夫系副教授格林里夫和穆勒-莎莉所编论文集也指出体现民间审美的克雷洛夫寓言更为畅销的情形，“诚如形式主义语言学家和语文学家波捷波尼亚所指出的，寓言在最基本层面上生成了文学思考。每个主要文本有自己的故事和道德，对我们来说，那些模式意味着是在叙述故事基础上进行阐释”^④。他们还揭示出 18 世纪经由法文和德文而俄译的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卡拉姆津的畅销小说《马尔法·帕萨德尼察》（1803）等在当时俄国受欢迎的具体状况。有意味的是，在该文集中，哥伦比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俄裔教授雷福曼特别重视别斯图耶夫（А. Бестужев）这位被称为拜伦式的畅销小说家，因他写了许多为读者所热衷的关于决斗之作，如《体验》（1831）等，被认为“扮演了

① James H. Bate, “Between Old and New: St. Petersburg in the Late Imperial Era”,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ed. by Michael H. Ham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1.

② William Edward Brown, *A History of 18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Ann Arbor, Michigan: Ardis, 1980, pp. 182–193.

③ William Edward Brown,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of the Romantic Period*. Vol. 1. Ann Arbor, Michigan: Ardis, 1986, p. 21.

④ Monika Greenleaf and Stephen Moeller – Sally (ed.), *Russian Subject: Empire, N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the Golden Age*.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9.

搭建俄罗斯文学有关‘决斗’话语之基本框架的角色。他的决斗故事在当时和后来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力”^①。如此解释，对认识其小说在当时和此后俄国何以畅销，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论及对18~19世纪初俄罗斯畅销文学之真相的发现，须重视俄侨学者施特里德特尔（Jurilj Striedter）在冷战正酣的60年代所取得的学术业绩。他出版了专门研究俄国大众文学的德文版著作《俄国流浪汉小说：论果戈理之前的俄罗斯长篇小说史》（1961）。他通过大量史料澄清源于西班牙、而后扩展到法国和英国的流浪汉小说，如何混合着历险记特点、被俄译的情形，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楚尔科夫和纳列日内、布尔加林等18~19世纪初作家的作品，因用当时上流社会所鄙视的低级俄语、普通市民感兴趣的讲故事方式，产生了体制大力支持的古典主义诗歌和戏剧所不及的影响力。石溪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的《出版、印刷和俄国知识分子生活之缘起，1700~1800》（1985），通过大量史料还原18世纪帝俄图书出版真相，让读者看到现代俄罗斯文学兴起百年中产生了许多通俗化的畅销作品^②。这一极富有史料价值之作，与苏联著名书籍史学家和俄联邦科学院院士巴伦巴乌姆（И. Баренбаум）教授所提供的《图书贸易和图书生产活动概论》（1961）、《图书彼得堡：三个世纪历史》（2003）等相比，更体现出斯拉夫学界关注图书生产的大众文化性。

更意味的是，冷战时代欧美大学语言文学系和比较文学系借助学院制度，促成文学批评方法探索远比苏联的要活跃得多，出现了许多新批评方法。置身于当时学术氛围中的斯拉夫学，受益于此。时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后来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和斯拉夫语言文学系讲座教授的托德三世，其《19世纪初俄国文学制度：边界与超越》（1986）就特别注意到，后来被认为是经典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当代英雄》等，在当时的影响力未必超过没得到体制支持的森科夫斯基作品的畅销程度，还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历史语境，“我们最好必须说，赞助人系统给作家们提供了持续创作的机会，如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也给予了生产各种词典、语法、修辞范式的机会，诗

^① Irina Reyfman, “Alexander Bestuzhev – Marlinsky: Bretteur and Apologist of the Duel”, in Monika Greenleaf & Stephen Moeller – Sally (ed.), *Russian Subject: Empire, N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the Golden Age*. p. 244, 257.

^② See Gary Mark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the Origins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Russia, 1700 – 180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歌又反过来帮助促成一个国家文学兴盛所需的语言学和文学符码”^①。这样的论述对我们从文学生产机制上认识俄国官方学术和教育体制所确定的经典，以及那些畅销不绝的大众文学在体制外仍有活力的真相，极有帮助。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主任杜勃连科教授在其《锻造国家作家：苏联文学文化之社会和美学根源》（2001）第四章讨论大众文学运动，大批工人和农民工从工人通讯员如何在红色政权的庇护下，通过意识形态所构筑的文学生产和消费制度，迅速成长为所在时代的时尚作家，分别表达着无产阶级或农民阶级作家对新政权的意识^②。

在冷战时代的斯拉夫学中，俄苏科幻小说研究占有特殊位置。工业革命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欧美的兴盛，刺激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英、法、德、美等国的科幻小说持续兴盛。冷战时代，西方为遏制苏联而加大对高科技的投入，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相应地，科幻小说也更为发达。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 年 4 月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激发了苏联科幻小说的发展，进而引起西方对高科技和科幻小说在苏联发展的兴致。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和史学家皮尔斯（John Pierce）编辑出版科幻小说爱好者杂志《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有意识收录苏联作家创作的作品。与此同时，格莱德（John Peter Glad）在博士学位论文《俄国科幻小说及其相关的批评行为》中系统探讨科幻小说及相应的文学批评在俄国的发展情况。布朗大学英文系主任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教授主编“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研究丛书，包括对苏联科幻小说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麦奎尔《红星：苏联科学小说的政治学方方面面》（1977）。麦奎尔在此指出，“现代科幻小说几乎就是政治小说。自从 19 世纪后期把过去的乌托邦传统和奇妙发明相交融以来，科幻小说扮演着传播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之广泛混合的角色”，科幻小说有时候类似于反乌托邦或政治讽刺的文类，但有着追求文学之政治意义传统的俄苏科幻小说，却和“俄罗斯共产主义乌托邦”息息相关。革命活动家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专家波格丹诺夫（А. Богданов）的科幻小说《红星》（1908）和《工程师门尼》（1912）开启了

① William Todd III, “Institution of Literature in Early – Nineteenth – Century Russia”, in Gary Saul Morson (ed.)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Russian Case Studies*. Stanford: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4.

② Evgeny Dobrenko, *The Making of the State Writer: Social and Aesthetic Origins of Soviet Literary Culture*. Trans. Jesse M. Sav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v, xvii – xviii.

这一潮流,《红星》构想了另一个星球,叙述这个星球人如何进行类似于地球人那样的社会革命;延续《红星》的叙述模式,在苏联时代,科学家、意识形态专家和科幻小说家组成了互动空间,他们强烈趋向于相信科学进步概念,从而使苏联科幻小说有别于西方,更未出现美国畅销书作家、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家反思和批评极权社会的科幻小说^①。作者描述俄国科幻小说史,发掘20世纪30年代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奠基人别利亚耶夫(А. Беляев)的《水下农夫》(1930)、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诸多创作等等,论述科幻小说在苏联和意识形态之关系问题,关注“苏联科幻小说读者的背景和态度”,认为“苏联科幻小说的政治影响力之最直接情形,是由属于人群庞大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推动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苏联科幻小说的读者很多不是科学家,并且这类作品分布在市民社会各个行业,包括音乐工作者、士兵和外交人员、党政官员和克格勃机构等皆热衷这类作品”^②。这种视角近乎发现了不同于苏联官方话语所建构的另一种俄罗斯文学。在此基础上,麦奎尔的《俄国科幻小说》(1981)更系统地讨论了科幻小说在俄国发展情况^③。

对俄国科幻小说的特别关注在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界得到延续,他们继续运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即把科幻小说和乌托邦、民主相关联,而不仅是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审美化。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一直是政治问题,一种有着不同寻常命运的文学样式:作为一种文学价值形式,乌托邦是永久疑问的对象,其政治地位在结构上也是令人疑惑的。其历史语境的变动对认识这种并非是一种趣味或个人判断的可变性则无能为力。如在冷战期间,乌托邦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忽视人性弱点和原罪的项目”,但乌托邦在苏联似乎恢复了作为政治口号和政治激励的活力,这种矛盾就要求读者考察乌托邦和政治之关系、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实践价值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和乌托邦进行区分^④。如此认知,亦被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班纳吉用于解释俄苏科幻小说:科技革命和大众媒介在西方、俄国近乎同时出现,俄国有科技的前瞻性思维却工业落后,有丰富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却在文化上处于前现代,藐视西方或视西方为遥远

① Patrick L. McGuire, *Red Stars: Political Aspect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77, p. 52, p. 60.

② Ibid, p. 92.

③ Neil Barron (ed.), *Anatomy of Wonder: A Critical Guide to Science Fiction*. New York: Bowker, 1981.

④ 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5, pp. xi - xii.

他者，这为科幻小说在俄国以独特方式发达起来提供了特殊语境，使科幻小说在帝俄末期和苏联成为乌托邦的言说方式之一；科幻小说在西方得到广泛的理论化研究，在俄国未得到充分探究，但不妨碍科幻小说在俄国创造出一系列共享的科技词汇、审美世界，“科幻小说这种新文类，不仅成为理解俄国现代化的一种形态，而且也积极参与对俄国现代性的独特建构。不同于欧美科幻小说，俄国科幻小说充满着显著的表述功能和教育功能，它们不能轻易总结为对科学和技术的被动领会，或对来自西方重要性作出对立的反应。相反，俄国科幻小说挪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手段，建构了可供选择的发展和进步之模式，甚至提出俄国是比西方更为现代的叙述方式”，其独特表述功能，表达了所谓文化教育的价值^①。如此深刻的论述，在她主编的《俄罗斯科幻小说和电影：批评指南》（2018）所辑录的 15 篇讨论俄国科幻小说和电影之作中更加具体化^②。

当然，冷战时代对俄国大众文学研究最有实绩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布鲁克斯。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斯拉夫学界特别重视俄国 19 ~ 20 世纪之交的诗歌、哲学，而他把斯拉夫学和历史学相结合，从俄国城市化进程中研究白银时代的大众文学，追溯白银时代大众文学的生产、消费问题，研究包括作家商业化写作如何促进文学发展的历史，而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即中断了大众文化进程，改变了大众文学在苏俄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使之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群众性文化。其力作《俄国人学会阅读时：1861 ~ 1917 年高雅文学和流行文化》（1985）按编年史方式描述城市化进程所促使的城镇和乡村教育发展，使有阅读能力的居民越来越多，为大众文学加速发展提供了基本资源。1861 ~ 1917 年大众文学得到长足发展，成为根源于又作用于正在变革的大众读者世界中的重要形式，“大众思维是俄国历史的一部分，大众文学的文化包括正统俄罗斯文化特征的大量线索。我们知道许多教育良好的俄国人的创造性世界，但不清楚审美想象和智识的俄国社会其他领域……1861 年解放宣言、城市化、工业化之增长，给大量下层阶级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新机会”，从事通俗文学的生产和销售便是其中的可能性之一，“具体的出版商和作者所取得的成功，通常仰赖于满足读者的消费要求，从而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有效果”。这样的大众文学，对认识俄国的意义巨大，

① Anindita Banerjee, *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 - 10.

② Anindita Banerjee (eds.), *Russian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nd Cinema: A Critical Reader*.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8.

“大众文学在俄国既反映了现实的落后，也显示出这个国家的快速发展。大众作家多是曾经的农民，他们和读者们有同样的社会背景，而这样的作家在过去是很少的。教育水平低的读者阅读能力如此之差，使作者不能广泛地借用俄罗斯知识分子文学，虽然他们能得到这些作品。这些底层文学生产者，无力把教育良好的文学传统吸收进他们的作品”，这样的作者和读者决定了大众文学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①。布鲁克斯如此创造性地把大众文学和城市化进程关联起来的方法论，在冷战结束后亦得到运用。《一个士兵是怎样救助彼得一世的》睿智地指出，新市民的主体中不少是信仰官方教会的农民工及其后代，这就使传统的民间叙述不会随现代化进程而消失，关于神化彼得一世的演义在19世纪始终是广为流行的畅销书^②。其《想象俄罗斯国家》描述其时大众文学在城市传播情况，出现了各种适应不同读者群的通俗杂志，与欧洲城市生活的商业化潮流下的大众文学发展相一致，但它是彰显帝俄认同的重要方式，而不只是为满足文化水平低的读者提供低级读物^③。其《契诃夫、托尔斯泰和1890年代带插画的报刊》论述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和托尔斯泰《复活》等后来被视为白银时代经典的文本，在大众媒介上如何被讨论的情形^④。《感谢您，斯大林同志！》描述其时布尔什维克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和挑起的阶级斗争，取缔既有出版社、创建红色出版社，建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在制度上统一了图书和报刊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培养出接受红色价值观和美学的苏联文化消费者，从而使社会出现了统一的声音，私人空间严重压缩，大众文学也由此变成了群众文化^⑤。布鲁克斯的这些研究，对整体把握大众文学在俄国不同于欧美的事实，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可见，二战后斯拉夫学迎合了冷战时代西方理论界重视大众文化之潮流，也关注到大众文学在俄国的存在及发展情况，从而不同于直接践行“遏制苏联”的苏联学，也异于那些无视俄国大众文学之事实的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界，为苏联官方所反对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在西方的畅销，做出了实质性贡献。而形式主义批评在很

① Jeffrey Brooks, *When Russia Learned to Read: Literac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1861 ~ 191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xv, xvi.

② Jeffrey Brooks, “How a Soldier Saved Peter I: A Kudzu Vine of Russia’s Popular Fiction”,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Vol. 35 Part 2 (summer, 2008), pp. 1 – 19.

③ Jeffrey Brooks, “The Russian Nation Imagined: The Peoples of Russia as Seen in Popular Imagery, 1860s – 1890s”, *Social History* (November, 2010).

④ “Chekhov, Tolstoy, and the Illustrated Press in the 1890s”,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Social History Society), 2010, Vol. 7.

⑤ Jeffrey Brooks,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大程度上仰赖于对 18~19 世纪初俄罗斯畅销小说的形式分析, 20 世纪 20 年代初艾亨鲍姆与蒂尼亚诺夫等形式主义批评家在彼得格勒大学组织文学研讨班, 结合许多大众文学作品, 引导青年批评家如何认识文学。60 年后帕罗特 (Ray Parrott) 翻译和编辑艾亨鲍姆与蒂尼亚诺夫汇编的学员们作业《俄罗斯叙事性作品》(1985), 让西方读者看到书信体、旅行记、浪漫主义时代名小说家别斯图耶夫-马尔林斯基的《贝洛左尔中尉》等畅销作品, 也使西方读者熟知了 18~19 世纪初俄国流行小说。相较于二战前的斯拉夫学, 冷战时代许多斯拉夫学家, 务实地面对俄罗斯大众文学之存在的事实, 为扩大认识俄罗斯文学空间提供了通道, 还促使斯拉夫学界在后冷战时代更系统而深入理解大众文学在俄国发展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

冷战结束后西方斯拉夫学界对俄罗斯大众文学的研究远比冷战时代要兴盛得多, 关注范围遍及帝俄、白银时代、苏联和后苏联每个时段的重要大众文学现象, 并且和后冷战时代西方人文学术发生从科学化的阐释转向新历史主义相一致, 即把大众文学置于俄国历史进程中来考察, 从而揭示出更多的俄罗斯大众文学真相及其业绩、问题。

首先, 对现代俄罗斯文学起源于 18 世纪的历史进行再考察, 辨析其中广为流行的通俗文学之真相。冷战结束后, 斯拉夫学界发现, “直到最近几十年, 18~19 世纪俄国商业文化仍是被严重忽视的领域, 部分原因在于对是否存在着这类文化, 缺乏共识”, 此举导致对文学史的书写就不会重视米哈伊尔·楚尔科夫和马特维·科马洛夫之类重要的畅销书作家^①。为此, 美国圣母大学副教授加斯佩瑞提把现代俄罗斯小说之兴起置于世俗化和欧洲化改革背景下探究: “彼得一世去世之后, 18 世纪俄罗斯文化中出现的模仿性批评在艺术领域日趋稳定。与彼得改革的依据相一致的是, 俄国考虑的是从国外选择他们的文学: 首先是从德意志, 而后是从法国, 最终在 18 世纪末从英国”。他选择世俗化的文学资源, 并引用别林斯基的诸多批评观点, 认为兴起于 18 世纪后半期的俄国小说, 发生了与

^① Lina Bernstein, “Russian Eighteenth - Century Popular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on Commerce”, *The Space of the Book: Print Culture in the Russian Social Imagination*, ed. by Miranda Remnek. Toronto, Bufalla,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n Pres, 2011, P. 30.

社会完全重组相一致的现象^①。在此基础上，论述 18 世纪那些著名的畅销小说缘起于翻译欧洲流行文学，造成当时著名的畅销书皆是模仿性的通俗小说，包括《爱情岛之旅》《靓丽厨娘》《万卡·卡因》等。接续这一研究，意大利学者弗兰基研究启蒙主义时代在英、法、德等流行的书信体和日记体文学是如何传播到俄国的，包括俄译卢梭《新爱洛依丝》和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俄国由此出现著名通俗作家艾明（Фёдор Эмин）创作的《厄内斯特和多拉芙拉信札》（1766）、亲临欧洲的卡拉姆津创作了畅销作品《一位俄罗斯旅行者的信札》（1790）等书信体作品^②。这种研究，与苏俄本土对 18 世纪文学的认知相去甚远。

由于城市化在 18 ~ 19 世纪俄国展开，市民大多由农民工或农民工后代所组成，以及帝俄强调现代化的斯拉夫性，这就使斯拉夫—俄罗斯民间文学不是消弭于城市化进程中，而是转化或融入传播得更广的大众文化中。凯莉教授就特别注意到这种现象，其《彼得鲁什卡：俄罗斯狂欢木偶戏》（1999 年初版，2009 年再版）探讨俄国街头最为流行的木偶剧《彼得鲁什卡》（Петрушка）及其演出历史，考证出完全不被主流俄国学界和斯拉夫学界所注意的街头木偶剧。这部 17 世纪出现于俄罗斯民间的剧作，随着帝俄—苏联疆域的扩大而扩展，和城市流行戏剧融合，甚至吸引了那些著名知识分子，如以写游记而著称的畅销书作家达利（Владимир Даль）在《鲜活大俄罗斯语言详解词典》（1861 ~ 1868）第四卷介绍过这一剧作，艺术史家和民间艺术收藏家罗温斯基（Д. Ровинский）的《俄罗斯民间图景》（1881）、白银时代著名象征主义文学家安德烈·别雷、《艺术世界》奠基人和艺术史学家伯努瓦（А. Бенуа）等各有回忆录论及《彼得鲁什卡》的观感。1907 年甚至有人撰文论及这部在俄国已延续二百多年的民间喜剧，“我宁可把《彼得鲁什卡》当作流行的文化文本，而非如此前解释者那样把它视为民间故事文本”，就这个剧作而言，“‘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术语意味着是同等重要的两个侧面，我相信关于传统与现代孰优孰劣之争乃空洞无聊之举。关于高雅文化理念‘堕落’到大众社会，或者相反，民间传统被拉抬到精英阶

① David Gasperetti, *The Rise of the Russian Novel: Carnival, Stylization and Mockery of the West*.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 pp. 11 - 12.

② M. Frannje, *The Epistolary Novel in Eighteenth - Century Russia*. Munchen, 2001.

层，那是无意义之说”^①。凯莉教授系统论述了该剧受欢迎的具体情况，包括在各城市露天剧场和游乐场的演出，还分析该作的内部结构、两位主角塑造，探讨它为何让一代代受众青睐的诗学问题。这种发觉俄国民间流行文学在城市化过程中变成通俗文化的成果，比苏联表面上重视人民性，实则忽视草根文化的官方文学史，要有价值得多。

重要的是，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界将 19~20 世纪之交俄国文学艺术扩大到大众戏剧领域。罗德岛大学教授惠斯顿作为研究俄国戏剧的专家，其《对俄国大众戏剧之影响，1886~1915 年》（1983）指出，戏剧作为这期间最为繁荣的艺术之一在帝俄最后 20 年焕发出魅力，既得到当局的政策性支持，又深得各阶层受众青睐^②。其《1862~1919 年俄国大众戏剧运动》（1998）从戏剧演出史角度论述这期间俄国戏剧因为公共剧院的建立，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大众文化运动，如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Н. Островский）这位职业戏剧艺术家，如何通过发挥戏剧的大众文化功能而名利双收，又贡献于社会。在此基础上，惠斯顿结合大量戏剧演出史料，论述城市化和工业化到了 19 世纪末如何锻造出新受众群和新戏剧市场，如托尔斯泰《黑暗的势力》、契诃夫《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高尔基《在底层》等后来被视为俄国戏剧文学的经典，在当时是怎样的流行戏剧，体现了当时帝俄的民主化程度^③。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教授萝莉（Alison Rowley）的《公开信：俄国大众文化和明信片图案，1880~1922 年》（2013），研究城市化如何开辟了俄国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空间，作为现代文明表达方式之一的明信片，在这期间以直观的审美形式彰显俄罗斯帝国的神奇，广为畅销。

不过，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对俄国大众文化研究最着力的，当属对苏联大众文化的再认识。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苏联的新思维改革正符合西方的民主化理念，斯拉夫学界重新燃起考察苏联时代的热诚，包括对苏联大众文学艺术的再发现。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斯蒂茨睿智地提出，“苏联历史已走向终结。我们如何评估苏联大众文化及娱乐的历史？其命运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包括跨越

① Catriona Kelly, *Petrushka, the Russian carnival puppet theatr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7-8, p. 49.

② Gary Thurston, “The Impact of Russian Popular Theater, 1886-1915”,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5, 2 (June 1983), pp. 237-267.

③ Gary Thurston, *The Popular theatre movement in Russia 1862-1919*.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 Press, 1998.

疆界的交流之自由程度、市场的出现及力量、非市场力量尤其是国家的内容和质量”^①。如此深刻的认知，一方面受益于冷战时代西方建构了一套关于大众文化的学说，包括把大众文化发达程度与这个国家的民主化、市场化的水平同步；另一方面得益于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俄国民主问题，此前他已出版《俄国女性的自由运动：女性主义、虚无主义、布尔什维主义，1860～1930》（1978）、《革命之梦：俄国革命中的乌托邦想象与经验生活》（1989）等。他明确指出：“绝大部分俄国文化研究之作讨论的是高级文化，尤其是文学……苏联大众艺术只是最近在西方得到广泛研究，以图改变至今仍只关注有高等美学价值的文学艺术并由此忽视大众电影之状态”^②。他按俄苏政治变迁的时间顺序，先后描述：1900～1917年俄国娱乐业中的大众文化（包括刚兴起的无声电影、小戏剧、通俗文学等）；1917～1927年革命年代意外成为大众娱乐业繁荣岁月，因为新经济政策把大众商业文化和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相融合；1928～1941年斯大林统治下娱乐业融入群众文化，历史小说广为畅销；1941～1953年战时和冷战初期的群众文化盛行程度难以想象，包括西蒙诺夫《等着我吧》之类正面书写战时情怀的作品，或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乃最为畅销作品；1953～1964年赫鲁晓夫时代畅销的是和解冻思潮相关的作品及其延申产品；1964～1984年勃列日涅夫时代，流行的是体现斯拉夫传统的乡村文学，怀旧性和思乡性作品盛行；1985年新思维改革时代的大众文化，电影工业和文学一样，创造了巨大的民主空间和文化市场。在司空见惯的苏联生活中发现大众文化及其活力，是斯拉夫学在后冷战时代的魅力所在，并且延续至今：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查特吉等人扩大了俄国大众文学研究的文化基础，把日常生活纳入考察范围，论述苏联最初30年日常生活、解冻思潮之后政治精英的审美观念向市民社会化的转化、勃列日涅夫时代大众文学所表现的日常生活性等重要问题^③。对苏联历史的大众文化考察，让读者看到了苏共意识形态掌控不了的苏联。

稍后，斯蒂茨主编的《战时俄国的文化和娱乐》（1995）专门考察二战期间苏联群众文化所发生的转型，包括正教会获得合法地位，东正教音乐和圣徒传迅速流行，《真理报》、苏联电台、苏联音乐、流行歌曲、戏剧等出现了把艺术、

① Richard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Entertainment and Society Since 1900*.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04.

② Ibid., p. 3.

③ Choi Chatterjee, David L. Ransel, Mary Cavender, Karen Petrone (ed.), *Everyday Life in Russia Past and Present*.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3.

审美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国家认同等融合在一起的变化，许多和苏共意识形态不相容的流行艺术，反而激发苏联人去抗战。迈阿密大学历史系教授诺里斯更是上溯到 1812 年卫国战争、1853 ~ 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1877 ~ 1878 年俄土战争、1904 ~ 1905 年俄日战争、1914 ~ 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所产生的通俗文学，它们和 1941 ~ 1945 年卫国战争期间出现的流行文化一样，无论是讴歌英雄的宣传画、历史演义，还是歌颂圣战，皆无不畅销，“苏联艺术家最终回到通俗文学样式”^①。与之相当，时任加拿大萨斯喀切温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麦卡恩（John McCannon）论述斯大林为彰显苏联社会主义威力，加大对北极的科学考察和苏联北极地区的开发，激发新闻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家提供许多有关北极的摄影、绘画、音乐、小说、舞蹈等通俗艺术，或以修辞性表达，或以有冲击力的色彩，或有感人的旋律，产生了北极属于苏联、苏联征服北极之伟大的审美效果^②。对苏联历史进行大众文化的辨析，揭示出苏联的另一个层面，显示出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对苏联认知的深刻性。

20 世纪 90 年代俄国盛行“去苏联化”、西方化，以民主概念重新检讨苏联，不断披露出苏联意识形态下大众审美表达、苏联国家认同遭遇民族身份困境等史料。这正与西方把包括流行文学艺术在内的大众文化视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相吻合。由此，斯拉夫学界立即注意到大众文化在后苏联的兴盛及其作用问题，并且把它和苏联政治变革关联在一起，“在苏联，高级文化之解体，或多或少是与极权主义之崩解相一致的，这种情形在急剧变化的电影和图书工业之命运中得到如此生动的呈现”^③。在这样情形下，研究苏联末期以来文学艺术和文化产业之风重新兴起。曾是乌克兰教授的朱科（Сергей Жук），2002 年后任职美国巴尔州立大学，其研究项目《与西方靠近之城：苏联乌克兰之晚期社会主义的文化消费、认同和意识形态，1964 ~ 1984》及其阶段性成果《第聂伯德涅波罗别特洛夫斯克的大众文化、认同和苏联青年，1959 ~ 1984》，描述当时该区域乌克兰人在长期存在的苏联群众文化与突然传播至此的西方流行文化之间如何选择的困扰，以及选择过程中交织着乌克兰认同和苏联身份的焦虑。他所提的问题极为深刻，在一

① Stephen M. Norris, *A War of Images: Russian Popular Prints, Wartime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1812 - 1945*.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5.

② Evgeny Dobrenko & Eric Naiman (ed.), *The Landscape of Stalinism: the Art and Ideology of Soviet Space*. Seattle, 2003, pp. 3 - 15.

③ Nancy Condee (ed.), *Soviet Hieroglyphics: Visual Culture in Late Twentieth - Century Russia*.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ix.

定程度预示了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原海牙历史正义与和解研究所所长雷贝克 (Timothy Ryback) 的《在那个集团周围摇摆：东欧和苏联的爵士乐史》(1990)，率先注意到群众艺术向大众艺术转换的情势。斯蒂茨《俄罗斯大众文化：1900年以来的娱乐和社会》(1992)甚至关注到苏联末期出现的色情文学，并认为那是白银时代文学之复兴——19~20世纪之交小说家库普林和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创作具有大众文学性，如《亚麻街》是关于妓院丑闻的报告文学，后苏联时代复兴了这样的文学，显示出俄国向自由民主方向发展。更有甚者，挪威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拉梅 (Sabrina Ramet)《撼动国家：东欧和俄国的爵士乐和政治》(1994)，逐日(1991年8月18~24日)分析“时代”(类似于“新闻联播”)等电视频道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中所扮演的媒体角色，断言俄联邦继续保存苏联时代建立的纪念碑，导致后苏联俄国仍生活“在纪念碑的阴影下”。与此同时，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克拉克 (Caterina Clark) 对苏联末期著名导演卡涅夫斯基 (В. Каневский) 所执导的黑白影片《衰落、死亡和苏醒》(1989)进行历史语境分析——以儿童眼光观察1947年小城生活，重新检讨斯大林体制下带来的生活贫穷、社会关系畸形。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内曼 (Eric Naiman) 对苏联著名导演戈沃卢欣 (С. Говорухин) 执导的《绝不能这样生活》(1990)和《我们失落的俄国》(1992)等进行学理性分析，俄亥俄州立大学戈西洛 (Helena Goscilo) 对当代俄罗斯文学中重新塑造母亲和祖国母亲形象的解读，匹兹堡大学教师康迪 (Nancy Condee) 及其同事帕杜诺夫 (Vladimir Padunov) 教授合作的《俄国消费文化ABC：阅读、收视率、不动产》对苏联末期社会变革进行大众文化理论分析，这些组成了康迪主编的《苏联难以识别的符号：20世纪末俄国视觉文化》(1995)^①。它和卫斯理学院社会学教授古什曼 (Thomas Cushman)《地下室手记：俄国爵士乐的反文化》(1995)、威廉和玛丽学院现代语言系副教授帕罗霍洛娃 (Elena Prokhorova) 和帕罗霍洛夫 (Alexander Prokhorov) 的《苏联晚期的电影和电视》(2013)、巴黎第十大学俄国研究和国际事务学院教师罗伯茨 (Graham H. Roberts)《新俄国的消费文化、时尚品牌和认同》(2016)等一道，不断扩大研究当代俄国的大众文化范围，也显示出斯拉夫学在后冷战时代的活力。

重要的是，苏联新思维改革终结了新闻审查制度，废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① Nancy Condee (ed.), *Soviet Hieroglyphics: Visual Culture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体系，作协民间化，《论据与事实》《独立报》《商人报》《地铁报》《明日报》《今日报》等贴近日常生活的新报纸，以及“独立台”“24 小时”“莫斯科六台”等新电视台，如雨后天春笋般冒起。《莫斯科共青团》等传统报纸也开始转型，它们延续“新思维”改革以来的潮流，定期播放嘲讽克里姆林宫的木偶剧、披露苏联罪恶的历史文献片等，极受大众欢迎。在此背景下，文学艺术不再有所谓官方意识形态限制，引进西方电影和电视剧的限制自动取消，出现了“埃克斯莫”“行动”“奥尔马”等热衷于大众文学的新出版社。俄国文化结构发生巨变，文学艺术上进行概念化的低级和高级区分的情形，变得不再重要，大众文化和高雅艺术的区分不再明确。波德罗夫（С. Бодров）执导的《山区囚犯》（1996）、列别捷夫（Н. Лебедев）的《星》（2002）等关于车臣战争的影片，和苏联时代著名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Н. Михалков）执导的《太阳焦灼》（1994）、《西伯利亚的理发师》（1999），以及罗戈日金（А. Рогожкин）执导的《警卫》（1989）、《百万富小姐》（1989）、《第三颗行星》（1990）、《和傻瓜在一起》（1993）等，罗普山斯基（К. Лопушанский）执导的《俄罗斯交响乐》（1994）和《世纪之末》（2001）等，无不成为受欢迎的大众艺术；这些由苏联转化而来的艺人，还分别于 2004、2007 年获国民艺术家称号。在这样的背景下，廉价的侦探小说动辄发行几十万的情形，更是文化生活的常态。面对如此变化，斯拉夫学不再如十月革命后十多年仍不正视红色苏俄发生的文学变化那样，而是率先关注这些大众文化。在时任亚利桑那大学副教授巴克尔（Adele Marie Barker）主编《消费俄国：戈尔巴乔夫之后的大众文化、性与社会》（1999）中，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教授博伊默（Birgit Beumers）^① 对后苏联时代的大众文化进行整体性描述，分别介绍并论述了新思维及其后的图书市场、戏剧市场化变化，关注到青年夜生活变化和美学表达，把它们作为苏俄重要的亚文化；关注和日常生活的文化、趣味、价值观等相关的大众小说，尤其是在苏联时代受限制却仍受热读的侦探小说盛行的情况，认为这种小说具有文学、社会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所必须重视的价值，如皮缅诺夫（А. Пименов）、安娜·马琳娜，以及阿库宁、东佐娃等，他们的作品常年高居销售排行榜前列，并被大量改编成影视剧。与这种概要性论述当代大众文化不同，康迪《帝国的踪迹：近年来的俄国电影》（2009）、诺里斯《新俄国的时尚历史：电影、记忆和爱国主义》（2012）等，深入辨析一些影

^① Pop Culture Russia! Media, Arts and Lifestyl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 - CLIO, 2005.

片是如何叙述那些导致俄国动荡不安的历史事件^①。

奥尔科特的《俄罗斯通俗文学：侦探小说和俄国犯罪方式》（2001）专注于后苏联侦探小说，认为从苏联到后苏联急剧转型的标志之一是，“新俄国以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而自豪。通俗音乐、内容肤浅的电影、通俗杂志、垃圾小说比比皆是”，其中最显著的是侦探小说的兴起。作者指出，这类畅销书并非突然出现的，60年代末以来苏联就拍摄了侦探片，如普京所喜欢的科热夫尼科夫（В. Кожевников）执导的影片《盾与剑》（1968），侦探小说也很兴盛，如著名作家艾特马托夫创作的《刽子手团伙》、阿斯塔菲耶夫发表的《忧郁的侦探》等。由此，后苏联俄国出现侦探小说潮流不奇怪，如1997年11月马琳娜作品位居莫斯科图书排行榜第六名，并且这样的侦探文学景观又与转型时代俄国法律失衡的现实相一致^②。当然，作者研究俄国侦探小说，也注意到其独到的现实基础——俄国是遵从道德和教会而非成文法看待“罪”与“罚”问题，强盗的犯罪行为不少是捍卫真理或公平正义，只是在形式上触犯了苏联的法律。

三

相较于冷战时代对大众文学在俄国发展境遇问题的认知，斯拉夫学界在后冷战时代的研究要系统得多，几乎涉及三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大众文学的所有重大领域。

在研究方法上，时常引入欧洲大众文学背景，方便读者对俄国相应的流行文学之认识，这是俄国本土学者所不及的。布鲁克斯在辨析大众文学在俄国的发展历史时，就把欧美大众文学纳入其中，如论及19~20世纪之交大众文学时，就引入柯南道尔在英美文坛的情况，并考证出福尔摩斯在俄国的译介情形（1907年首先在华沙的俄译刊行，1908年4月在彼得堡刊行四万册）。尼基金（П. Никитин）当时就发表了《夏洛克·福尔摩斯在俄国》（1907），内容涉及主人公在敖德萨遇到好心的吉普赛人、在弗拉基米尔州遇到造伪币者、在亚速海遇到海盗的情况。论及白银时代最著名的女性畅销书作家韦尔彼茨卡娅，他就将其与同时期英国著名作家格林（Elinor Glyn）、克雷利（Marie Corelli）对比，断言

^① Nancy Condee, *Imperial Trace: Recent Russian Cinem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Anthony Olcott, *Russian Pulp: The Detektiv and the Russian Way of Crime*. Lanham, etc.: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p. 5-13.

“俄国和西欧或美国的强盗小说（bandit）或流浪汉小说（outcast）主人公存有区别”^①，进而可以看出俄国大众文学和西欧之差别。西欧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到处历险，而俄国的历险记则不同，即主人公无论在哪里活动，最终要回到他们原来社区。奥尔科特注意到侦探小说在苏俄和西方之差别，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因而俄语中“侦探小说”（детектив）并不是西方的侦探故事，在苏联时代这种作品的主人公包括警察、侦探、调查者和克格勃代理人，但和“民主”价值观无关^②。斯蒂茨研究苏联时代的大众文化时发现，苏共试图掌控群众文化的生产、消费，但大众文化仍然成长起来，并断言“苏联社会是置身于世界文化体系之中的，在某种程度上称之为‘美国化’”^③。与之相当，惠斯顿认为大众戏剧运动作为启蒙运动力量始于 18 世纪西欧。在巴黎和柏林，劳工阶级成为戏剧消费的群体之一，在俄国则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流的俄语剧作家比德语的少，到一战之前，俄国人引以为傲的仍然是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但是“布尔什维克在苏俄国家生活中的中心化地位以及国家剧院的建立，可以认为俄国在国家剧院方面获得的成功要好于英国”^④。在论述当代著名女性侦探小说家马琳娜时，巴纳德学院教授涅波梅什引入英国电视剧《头号嫌疑犯》、美国小说家康韦尔的小说《验尸》、电影《沉默的羔羊》等进行对比，帮助读者更好认识当代俄罗斯侦探小说^⑤。

不可否认，对大众文学在俄国的境遇，西方斯拉夫学界的认知也有矛盾之处。苏联时代广泛流行科幻小说、历史小说、犯罪小说、幽默小说等，但 1922 年之后那些面向人民的大众商业文学，却被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政策禁止，即便有些作品还保存在图书馆里，但阅读困难度很大^⑥。对于苏联科幻小说，麦奎尔有时候不以为然地认为，“虽然和西方科幻小说家那样使用一些共同的因素，但没有共同地唤起敬畏宗教之目的。……苏联作家似乎更宽容类似神秘投机，即便

① Jeffrey Brooks, *When Russia Learned to Read: Literac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1861 ~ 1917*. pp. 142 - 154, p. 168.

② Anthony Olcott, *Russian Pulp: The Detektiv and the Russian Way of Crime*. Lanham, 2001, p. 25.

③ Richard Stites, *Russian Popular Culture: Entertainment and Society since 1900*.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06.

④ Gary Thurston, *The Popular Theatre Movement in Russia 1862 - 1919*.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 Press, 1998, p. 10.

⑤ Catharine Theimer Nepomnyashchy, “Makets, Mirrors and Mayhem: Aleksandra Marinina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Russian Detektiv”, in Adele Marie Barker (ed.), *Consuming Russia: Popular Culture, Sex, and Society since Gorbachev*.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71 - 173.

⑥ Jeffrey Brooks, *When Russia Learned to Read: Literac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1861 ~ 1917*. p. xx.

他们并不接受它们”。他认为，苏联科幻小说和苏联文化及政治一样，70年来基本上处于不稳定状态，“免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统治下支持意识形态的义务”^①。按麦奎尔的认知，苏联科幻小说是超越苏联话语的，解冻思潮之后苏联作协修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删除了“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外加此时苏联高科技飞跃，使得科幻小说在苏联非常繁荣。另外，苏联时代的领袖崇拜和造型艺术一体化，街道、社区、公园、校园等等随处可见，这是苏联群众文化的一部分，但苏侨学者特蕾莎却把这些体现苏俄国家宏大叙事的雕塑视为低俗作品^②。然而，著名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讽刺性模拟这些国家宏大叙事的手法，制造出相应的流行文化“社会（主义）—艺术”（Соц-арт），却被国际艺术界承认为重要的大众艺术。1997年他受邀在纽约展览这类艺术，让美国受众看到了苏联时代国家意识形态规训下的艺术审美悖论。此外，斯拉夫学家关注到当代电影艺术和文学中的色情问题，并对其文化意义进行发掘，但是阐释力度不足；同样，他们注意到养宠物狗、身体刺青、肥皂剧之类当代时尚现象，却没有充分考虑转型国家对西方价值观的复杂态度，更多地只是陈述这种现象，而对此缺乏深刻分析^③。

当然，西方斯拉夫学界重视俄罗斯大众文学和文化，并发掘出不同于俄国学界认知的意义，是因为有欧洲人文学术传统的框架，以及受惠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的进步。凯莉与谢泼德（David Shepherd）教授合编的《俄国文化研究导论》（1998）对俄国主流社会不以为然却规模庞大的当代大众文化现象及其意义进行研究，揭示出普遍意义。在斯拉夫学界所建构的俄罗斯文化体系中，俄罗斯大众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纽约石溪大学教授雷热夫斯基（Nicholas Rzhevsky）主编的《剑桥现代俄罗斯文化指南》（1998）中，“俄语”和“俄罗斯东正教”乃俄罗斯认同之缘起，“俄罗斯大众文化”则是现代“俄罗斯认同”的重要方式。凯莉认为，（1）自彼得一世改革以降的俄国社会世俗化过程中，大量译介了欧洲流行文学，即使是贵族阶层对包括这些流行文学以及俄国作家模仿创作的通俗文学，也无法抵挡。（2）效仿欧洲模式的城市化过程及

① Patrick L. McGuire, *Red Stars: Political Aspect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n Arbor, pp. 21–23.

② Theresa Saboni-Chafee, “Communism as Kitsch: Soviet Symbols in Post-Soviet Society”, in Adele Marie Barker (ed.), *Consuming Russia: Popular Culture, Sex, and Society since Gorbachev*. pp. 376–377.

③ Adele Marie Barker, “Going to the Dogs: Pet Life in the New Russia”, in Adele Marie Barker (ed.), *Consuming Russia: Popular Culture, Sex, and Society since Gorbachev*. pp. 266–277, pp. 266–280.

其所带来的世俗化，激发了俄国知识分子对斯拉夫—俄罗斯民间文学的热衷，搜集、编辑刊行各种民间故事集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并且这些民间故事惠及一代代作家的创作。普希金的《神父及其仆人巴尔达的故事》就类似于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抒情歌谣集》；上文提及的乌克兰裔作家达理就是以搜集和创作民间文学而著名的；阿法纳西耶夫（А. Н. Афанасьев）搜集整理了《俄罗斯故事集》《斯拉夫诗歌中对的大自然观》（1865 ~ 1869）等畅销至今的流行作品；甚至曾在尼古拉一世官方文化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间文化，在斯大林统治期间的流行文化中也有相当重要位置。这种民间文学传统持续与意识形态直接干预下的文学艺术保持相当的距离，成为苏联时代艺术活力的又一个来源。（3）俄国的现代主义运动有其强大的城市文明基础，导致在 20 世纪 10 ~ 20 年代的大众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1907）和韦尔彼茨卡娅的《幸福密匙》等著名畅销书。（4）科幻小说和历史小说作为俄国流行文学的重要样式，深得那些希望获得更多知识的读者之热衷^①。应该说，凯莉恰当地综述了大众文学在促成俄罗斯认同的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同样，布鲁克斯和朱克教授合编的《牛津 20 世纪俄国手册》（2010），把布尔什维克体制稳定之后所生产出的苏联大众文化及其消费，视为理解 20 世纪俄罗斯问题的重要领域。布鲁克斯的《俄国文学和流行文化》也成为艾特金德、尼瓦、谢尔曼主编的《俄罗斯文学史》（1992）的重要内容^②。而且，这类研究也越来越被俄国学界所承认，如勃兰登堡等关于俄罗斯大众文化研究之作被收录于“当代西方俄罗斯学”译丛（2009）^③，洛维尔和门塞尔论述 1986 ~ 2004 年间苏俄流行文学创作和阅读的著作很快就在俄国被推介^④。

总之，面对规模庞大的俄罗斯大众文学之事实，19 世纪中叶就逐渐形成的斯拉夫学到冷战伊始才正视其存在，并对其发掘和研究，作出了不同于俄国本土的解释。尤其是，他们用欧洲人学术概念和时代的价值观去审视，看到了俄罗斯大众文学的独特性，从而与直接成为冷战一部分的“苏联学”区分开来。而这样的认

① Catriona Kelly, “Popular Culture”, Nicholas Rzhevsk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Russian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5 – 158.

② M. M. Efim Etkind, Georges Nivat and Ilya Serman (ed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Russe*.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Press, 2011, pp. 1 – 40.

③ Davi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 – 1956*. Cambridge, et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Stephen Lovell and Birgit Menzel (ed.), *Reading for Entertainment in Contemporary Russia: Post – Soviet Popular Litera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ünchen: Sagner, 2005.

知，与西方大众文化影响苏俄一样是相呼应的。自解冻思潮之后，非苏共文化在苏俄持续扩大，就因为西方影响。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到达柏林之后体验了西方文化魅力，而解冻思潮之后好莱坞电影进入苏俄。列宁格勒涅瓦大街战后汇集了模仿纽约百老汇（Broadway）的艺术而被称之为“百老”路（Broad），莫斯科从莫斯科饭店到普希金广场的高尔基大街也被戏称“百老”路，他们生产了西方化青年的亚文化，美国爵士乐、牛仔裤和体现美国自由精神的海明威作品等率先从这些地方流行出去。1956年苏联停止干扰BBC和美国之音俄语台的播放，即便1968年重新恢复对它们的监听，也没有妨碍苏联人对西方流行音乐的热诚。从1960年到1985年苏联生产磁带录音机由近13万台增长到近500万台，目的之一是要收听西方流行音乐。西方流行音乐激发出斯拉夫—俄罗斯旋律的爵士乐、探戈舞，如20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女演员之春》、1991年流行的歌曲《俄罗斯相册》^①。斯拉夫学对俄罗斯大众文学的重视，也符合俄国那些杰出理论家的主张，如日尔蒙斯基《文学理论》（1924）呼吁，“文学传统的诸多问题，要求我们广泛研究大众文学”^②；苏俄科学院院士洛特曼声称，“研究‘大众文化’成为当代社会学中最尖锐问题之一。大众文化直接影响了当代艺术，尤其是直接和20世纪大众媒介的技术成就相关联的那些当代艺术种类之研究者的理论建构。在这种情形中，适时地令人想起这个主题并不是那样崭新，而是有着直接相关的材料，是传统的文学历史研究问题。”^③

遗憾的是，斯拉夫学是作为区域研究存在的，它近半个多世纪来对俄罗斯大众文学所进行的严肃探讨及其成果，不敌西方人文社会学界的政治正确，从而未能改变大众文化理论的结构。英国拉夫伯勒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皮克林主编的四卷本《大众文化》（2010），汇集了论述大众文化的经典文献，包括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几乎皆不曾涉及俄国大众文学问题^④。同样，格洛格（Martin Gloger）的《大众文化中的资本主义精神》（2012）也不涉及俄罗斯大众文学案例。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Adele Marie Barker (ed.), *Consuming Russia: Popular Culture, Sex, and Society since Gorbachev*. pp. 82 – 83.

② Жирмунский,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этика, стилистика. Л., 1977.

③ Юрий Лотман,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Том 3. Таллин: Александра, 1993, С. 383.

④ Michael Pickering (e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0.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specific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tren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biosecurity crisis in Eurasia,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differences in values betwee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the strategic game of Eurasia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gional biosecurity. Based on different values, China, the U. S. and Russia hav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strategic expectations for biosecurity in Eurasia. Facing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complex biosecurity situation, Eurasia urgently needs more effective public governance products to deal with the development crisis. China's governance plan, which takes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s the core value, advocat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emands of all parties for biosecurity development, taking the realization of 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s the ultimate goal, and building a safeguard system for biosecurity in Eurasia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China plan for biosafety governanc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deal with the biosecurity crisis in Eurasia, and also a great innovation and intelligent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biosecurity governance thinking.

Key Words: Biosecurity, Great Power Game, SCO,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Study of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Popular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Slavic Studies

Lin Jinghua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itiated by Peter I also promoted urban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in the Russian Empire,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opular literature in Russia. The purpo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art by Russian Empire and the Soviet Union was to cultivate the residents' elegant aesthetic tast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consciously designed the censorship system, the mechanism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anoniz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divided literature and art into high and low levels to exclude popular literature in Western Europe. In this way, even though the 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three hundred years of Russian urbanization has been a huge fact, it has no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of the mainstream academic circles in Russi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just as critics in every era of Russia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this literary phenomen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era, Western Slavic studies have faced up to the fact that popular literature exists in Russia, and,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European humanistic academic paradigm, regarded popular literature as a democratic expression, and discussed Russian popular literature differently from Russia. For example, it discovered the uniqueness of Soviet science fiction and Russian detective stories.

Key Words: Russia, Popular Literature, Slavic Studies, Cold War, Post – Cold War